

2

世紀論叢

全球關係中的中國處境

汪暉 余國良 編

亨廷頓

金觀濤

劉小楓

許倬雲

何信全

劉述先

劉軍寧

甘 陽

傅高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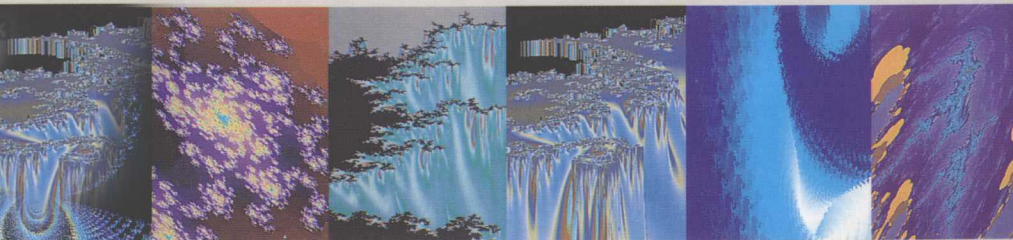
納 伊

翁松燃

吳國光

陳 彥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二十一世紀論叢(二)

全球關係中的中國處境

汪暉 余國良 編



中文大學出版

編者前言

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上發表了題為〈文明的衝突？〉的論文，對未來國際關係作出了一種規範性分析。同年10月，《二十一世紀》率先在中文世界全文發表了該文的中文版本，並配有金觀濤、劉小楓、陳方正的討論文章。幾乎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內部報紙《參考消息》也摘登了該文，並發表了西方學者對於此文的批評文章。在那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中文學界的各種刊物和報紙都發表了相關的討論。如果稍加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討論逐漸從對於亨廷頓有關世界衝突的觀點的評論轉向了有關民族主義的爭論，其中的一些討論還涉及到中國和亞洲的崛起與新的世界秩序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文明衝突論」在中國所引起的廣泛討論是和另一場討論在時間和內容上都密切相關的，這就是有關東方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文化多元主義的討論。也許可以說，這兩個方面一左一右為當代民族主義討論提供了素材。

亨廷頓的核心觀點是「新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於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割人類和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務中，民族國家仍會舉足輕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衝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鬥線」。亨廷頓用一種規範的方式區別了法國大革命以前的君主衝突、法國大革命後的民族國家衝突、俄國革命後的意識形態衝突，其核心觀念在於這些衝突都可以被理解為西方文明的內部衝突；而當代世界和未來的衝突卻是文明的衝突，世界政治也因而可以概括為文明的政治。正是在這種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義下的歷史客體，而像西方一樣成為推動、塑造歷史的力量」。

對於亨廷頓來說，文明衝突的另一種表述就是國際關係的非西方化。換言之，取代意識形態和其他形式的衝突的文明衝突包含着某種不可調和的性質，因為不同文明的價值具有不可通約的特徵。在文明衝突的視野中，自由主義和西方文明的普遍主義無法被理解為一種「普遍價值」，而只能被看作是假借普遍主義形式的特殊主義。亨廷頓明確地站在西方利益的立場陳述問題，但在描述方式上卻與許多文化多元主義者如出一轍，儘管他們雙方很可能都不太願意承認。文化多元主義者和亨廷頓都使我們感到：在當代世界的關係中，「尋求共識」已經較之任何時代都更為困難了。

在這一衝突的世界圖景中，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才能形成平等與公正的世界關係。從平等政治的角度看，亨廷頓

的論文有以下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第一，亨廷頓關於世界衝突模式的規範描述把「文化差異」作為影響甚至支配經濟、政治和軍事衝突的根本要素，這從一個不同或相反的方向重複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問題意識；那麼，文化差異是否已經成為主導未來衝突的根本因素呢？第二，亨廷頓認為「文明共通性」或「文化差異」已經取代政治意識形態和傳統勢力平衡而成為國際合作與聯盟的基礎，因此，文明相左的世界無可避免是雙重標準的；那麼，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應該如何面對這個不平等的、雙重標準的世界，並建立自己的合作和聯盟？第三，國際的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和安全體系雖然假借「世界整體」的名目，但它不過是西方維持其優勢、保障其利益、宣揚其政治及經濟價值的工具；那麼，中國應該用甚麼方式參與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用甚麼價值指導自己面對世界？除了亨廷頓的文章外，收錄在本書的其他15篇文章就是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自香港、台灣、中國大陸和美國，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論和文化背景。一般而言，中國學者大多不同意亨廷頓的基本觀點，認為亨氏的論文充滿了西方霸權主義味道，是西方中心論心態的產物。但是，他們各自的理由並不相同。他們或者根本否定亨廷頓的描述，認為他對現代世界歷史的基本描述是錯誤的；或者認為支配未來衝突的根本因素仍然是利益或意識形態，而不是文明；或者主張用理性民族主義來對抗世界霸權；或者認為必須形成新的世界意識避免未來的衝突；或者論證中國不存在威脅世界安全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項討論尚未終結，因為它涉

及的不僅是亨廷頓的文章，而且是當代世界的平等世界關係，以及試圖重構這種關係的種種努力。

亨廷頓的規範式描述意味着，即使暫不討論具體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關係，一項有關國際關係的基本規範的正義理論首先必須滿足這樣幾項條件：第一，它必須能夠在保障「文化差異」的前提下消除由此帶來的衝突因素；第二，它必須建立一種對待不同文化的平等原則，從而消除雙重標準；第三，這一原則應該有助於消除當代世界的霸權關係，在國際組織和國際關係中實施平等的政治。那麼，當代中國學者的討論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那些視野呢？

本書是對這些問題的初步回答，相信讀者能夠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編者

1997年11月

目 錄

v	編者前言	
	I 文明衝突論及其批評	
3	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 (余國良譯)
31	西方中心論的破滅 —— 評全球文化衝突論	金觀濤
39	利益重於文化	劉小楓
43	走向整合的世界	許倬雲
49	文化：世界衝突的來源抑或融合的起點？	何信全
55	儒家思想與未來世界的相干性	劉述先
63	殊別價值與普世價值之間 ——「文明衝突」的另一面	劉軍寧
71	外交不是內政的延長	甘 陽
77	東西文化 勢將會合	傅高義

II 中國的崛起與國際政治

83	中美關係與世界秩序	納 伊
91	中國的崛起與東亞安全	傅高義(林立偉譯)
103	「中國威脅論」芻議	翁松燃
115	以理性民族主義抗衡「圍堵中國」	吳國光
129	警惕民族主義成為主導意識形態 ——與吳國光先生商榷	陳 彥
141	再論「理性民族主義」——答陳彥	吳國光
153	論中國民族主義與世界意識	陳方正

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美國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

一 下一種衝突模式

世界政治正進入新階段，學者紛紛預測它的形態——歷史的終結、民族國家恢復傳統的競爭、民族國家在部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張力下衰落等等。這些看法各自反映了現實的一面，但全都不能抓到未來國際政治最重要、最核心的問題。

我認為新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於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務中，民族國家仍會舉足輕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衝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鬥線。

文明的衝突是近代世界衝突演化的最新階段。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 產生的近代國際制度出現後一

個半世紀，西方世界的衝突大部分發生在君主之間——也就是說，發生在那些試圖擴張其官僚機構、軍隊、商業經濟力量和最主要是領土的帝王、獨裁君主和立憲君主之間。在這過程中出現了民族國家。自法國大革命開始，衝突主線就從君主轉移到民族國家之間了。巴爾麥(R. R. Palmer)指出，從1793年起，「君主的戰爭已經完結，人民戰爭剛開始」。這種十九世紀的模式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然後，由於俄國革命及其引起的反應，國家的衝突讓位給意識形態的衝突。先是共產主義、法西斯—納粹主義以及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衝突，後是共產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衝突。冷戰期間，後者體現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角力。在歐洲傳統中，它們都不是民族國家，而是認同於各自的意識形態的。

君主、民族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內部衝突，即林特(William Lind)所謂的「西方的內戰」。這說法對冷戰、對兩次世界大戰，乃至對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早期戰爭來說，都同樣適用。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已邁出西方階段，重心轉到西方與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彼此間的相互作用上。在涉及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義下的歷史客體，而像西方一樣成為推動、塑造歷史的力量。

二 文明的本質

冷戰期間，世界分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這種區分現在已沒有太大意義。現在以文化和文明來區分國家，要比以政治、經濟體制或者經濟發展水平來區分更有意義。

所謂文明到底是甚麼意思？文明是一個文化單位。鄉村、區域、族群、民族、教派等等，都各有殊別的文化 and 不同程度的內部文化差異。意大利南部村莊的文化可能與北部村莊不同，但它們同屬與德國村莊有別的意大利文化。歐洲社群共有的文化形態，則使它們與阿拉伯或中國社群分別開來。可是，阿拉伯、中國和西方並非更高層的文化，而是各別構成了文明。因此，文明是人類文化最高層次的組合，也是人類文化認同的最廣領域：再要推廣就是人類與禽獸的分別了。它一方面由語言、歷史、宗教、風俗、制度等共同客觀因素決定，另一方面也有個人主觀認同的因素。認同可以有許多不同層次：一個羅馬居民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自認為是羅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徒、歐洲人或西方人，而他所屬的文明則是自我認同的最寬廣層次。由於人們可以而且實際上會改變認同，因此文明的從屬份子與界限也會有變。

文明可能涉及一大群人，例如中國（白魯恂Lucian Pye所謂「一個以國家自居的文明」）；或者一小撮人，例如說英語的加勒比海人。文明可能包含幾個民族國家，例如西方、拉丁美洲與阿拉伯文明；或者一個國家，例如日本文明。文明顯然會混合和相疊，亦可能包含許多子文明。西方文明包含歐洲和北美洲，伊斯蘭文明則有阿拉伯、土耳其語族和馬來語族。然而，這些皆無礙文明之為有意義的實體：文明間的分界儘管模糊，但它還是真實的。文明是動態的：它們有興有衰、有分有合。讀歷史的人都知道，文明也會被時間埋葬。

西方人總認為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的要角，可是這狀況只維持了幾個世紀。長遠來說，人類歷史的主線還是文明。湯因比（Arnold Toynbee）在《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裏提到21種主要文明，但存留至今的只有6種而已。

三 為何文明會衝突

文明的認同在未來日益重要，世界形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七八種主要文明的互動：它們包括西方、儒家、日本、伊斯蘭、印度教、斯拉夫—東正教、拉丁美洲，亦可能包含非洲文明等。未來最重要的衝突將發生在文明間的斷層線上。

為甚麼會這樣呢？

第一，文明的相異不單真實而且基本。文明被歷史、語言、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被宗教所區隔。不同文明對上帝與人、個體與群體、公民與國家、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的種種關係有不同的觀點，而對權利與責任、自由與權威、平等與階級的相對重要性亦有迥異的看法。這些差異在歷史上產生，不會立即消失，且比政治意識形態及政權的差異更為基本。差異不一定意味衝突，衝突亦不一定隱含暴力，但長久以來，由此引起的衝突往往最持久、最暴虐。

第二，世界的距離拉得愈來愈近。民族間的互動日趨頻繁，這一方面加強了文明意識，另一方面亦加強彼此的差異性與內部的共通性。北非人移居法國引起法國人的敵視情緒，亦因此強化了法國人對「善良的」歐洲天主教波蘭移民的接受力。美國人對日本人投資的負面反應，遠超過加拿大及歐洲。何羅維策 (Donald Horowitz) 指出：「在尼日利亞東部地區的伊博人可能是……奧華利或安尼沙的伊博人。在拉各斯他是伊博人，在倫敦卻是尼日利亞人，在紐約則是非洲人。」民族間的互動，強化了他們的文明意識，亦由此激發彼此的差異和仇恨，而這些差異與仇恨往往源自歷史的深處。

第三，全球經濟現代化與社會轉型的歷程，一方面使人超越長期以來的本土認同，而另一方面，民族國家不再是認同的

唯一來源。世界大多數地方，宗教都以原教旨運動的形式填塞這個真空，它可見諸西方的基督宗教、猶太教、佛教及印度教甚或是伊斯蘭教。在大多數國家及宗教裏，活躍於原教旨運動的，往往是那些年輕且受大專教育的中產階級技師、專業人員和商人。韋格爾 (George Weigel) 曾說：「全球非世俗化過程是二十世紀末一個突出的社會事實。」宗教復興——革培爾 (Gilles Kepel) 所謂「上帝的報復」(la revanche de Dieu)——提供了認同與委身的基礎，它超越國界且凝聚不同文明。

第四，西方的雙重角色加強文明意識的增長。一方面，西方正處於權力高峰，但與此同時 (又或許是前者的結果)，又可以看到非西方文化正出現回歸根源的現象。愈來愈多人談及有關日本內轉並「亞洲化」的趨勢；尼赫魯政權結束與印度的「印度教化」；西方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破產，引致中東「再次皈依伊斯蘭」；而俄羅斯則有西化與俄羅斯化的激辯。西方雖處於權力高峰，卻正面對非西方世界以更強烈的欲望、更堅強的意志及更充沛的資源來決定世界的未來。

過去，非西方社會精英通常與西方有深厚淵源，他們在牛津、巴黎大學索邦分校或英國陸軍軍官學校受教育，汲取西方的處事方式和價值，但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普羅大眾仍深受固有文化影響。可是，這種情況現在倒轉了：精英份子的非西方化與本土化正在展開，相反，西方 (通常是美國) 的文化、作風與習慣卻在大眾中愈來愈普及。

第五，文化的特質與差異較在政治及經濟上的更難改變，也更不容易妥協與解決。在前蘇聯，共產主義者可以變成民主主義者，貧富亦可易位。可是，俄羅斯人卻不能變成愛沙尼亞人，阿塞拜疆人亦不能變為亞美尼亞人。就階級與意識形態衝突言，關鍵問題是：「你到底站在哪一方？」人們可以，並且事

實上會選擇並改變立場。而文化衝突的問題則在：「你是甚麼？」但這是既定且不能改變的。眾所周知，從波斯尼亞到高加索到蘇丹，錯誤的答案可能使人賠上性命。宗教歧視比種族問題更為尖刻與排他。一個人可以擁有法國與阿拉伯的血統，或同時是兩國公民，但他卻不能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回教徒。

最後，經濟區域主義日益抬頭。1980-1989年間，各區域內的總體貿易比率有上升趨勢。歐洲由51%上升至59%，東亞由33%上升至37%，而北美則由32%上升至36%。區域性經濟集團在未來的重要性可能會增加。成功的經濟區域主義一方面增強了文明意識；另一方面，只有當經濟區域主義植根於共同的文明中才能成功。歐洲共同體以歐洲文化及西方基督宗教為共同基礎。北美自由貿易區能否成功，端視刻下正進行匯合的墨西哥、加拿大及美國文化。相比之下，由於日本是個獨特的社會與文明，所以它在東亞創設一個類似的經濟實體時就面臨着許多困難。不管日本與其他東亞國家發展的貿易與投資聯繫網絡如何增強，而文化的差異卻抑制甚或阻斷了日本倡導像歐洲及北美的區域性經濟整合。

相形之下，共同文化顯然促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台灣、新加坡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華人社會在經濟關係上的急速擴張。冷戰結束後，文化共同性逐漸克服了意識形態的差異，中國大陸與台灣亦較以前走得更为接近。如果文化的共同性是經濟整合的先決條件，那麼未來最主要的東亞經濟集團很可能會以中國為中心。事實上，這集團早已存在。正如韋登鮑姆(Murray Weidenbaum)所見：¹

儘管日本目前在亞洲區域居主導地位，但以中國人為主的亞洲經濟正急速崛起為新的工商業、金融的強有力中心。

這個戰略性地區具有相當大的科技與生產能力(台灣)；卓越的企業、行銷及服務頭腦(香港)；良好的通訊網絡(新加坡)；龐大的金融資本結集(以上三地)，以及可供使用的廣袤土地、資源與勞動力(中國大陸)……從廣州到新加坡、從吉隆坡到馬尼拉，這個受傳統宗族精神牽引而深具影響力的網絡，被視為東亞經濟的脊梁。

文化與宗教亦構成經濟合作組織的基礎，這個組織將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薩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及阿富汗等十個非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凝聚一起。由於部分國家領袖得悉無法獲准加入歐洲共同體，促使這個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及伊朗於60年代創立的組織得以復興與擴展。同樣的，加勒比海共同市場、中美洲共同市場與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場亦各自以共同文化為基礎。企圖建立更廣闊的加勒比海—中美洲經濟實體，彌合盎格魯系統與拉丁系統的努力至今仍是失敗的。

由於人們以種族及宗教來界定自己的身分，因而往往認為在他們與不同種族或宗教的人之間，存在一種「我們」與「他們」的對立關係。由於東歐及前蘇聯境內藉意識形態來界定的國家相繼解體，傳統的種族身分認同及種族仇視伺機抬頭。文化與宗教的差異亦令政策分歧：從人權、移民到貿易；由商業到環境等等不一而足。地理上的近鄰觸發了從波斯尼亞到明達瑙島的領土糾紛。最重要的是，西方倡議民主與自由主義為普遍價值，維持其軍事優勢與促進其經濟利益的種種努力，最終激起其他文明的負面反應。當政府與集團愈不能用意識形態來尋找支持與結盟，它便愈發訴諸共同信仰與文明認同來達致這些目的。

因而，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觀察文明的衝突。在微觀層次來說，不同文明間斷層線上的鄰接集團，常常為領土及控制權而鬥爭（這些鬥爭通常以暴虐方式出現）。在宏觀層次上，文明相異的國家為了相關的軍事與經濟力量而競逐，為了爭奪國際組織及第三勢力的控制而鬥爭，亦為了倡議各別的政治及宗教價值而互相角力。

四 文明間的斷層線

文明間的斷層線取代冷戰期的政治及意識形態界限，成為危機及流血的爆發點。冷戰始於鐵幕從政治上與意識形態上把歐洲分隔的時候，它亦隨着鐵幕的終結而結束。歐洲的意識形態分界已經消失，但文化分界則再次浮現：一方面是西方的基督宗教，另一方面是東正教與伊斯蘭教。華萊士 (William Wallace) 指出：歐洲最重要的分界線，大概是公元1500年西方基督宗教的東部邊界。這條線沿着今日芬蘭與俄羅斯以及波羅的海諸國與俄羅斯邊境延伸，而貫穿白俄羅斯與烏克蘭境內，將以天主教為主的烏克蘭西部與以東正教為主的烏克蘭東部分開，向西轉移把特蘭西瓦尼亞從整個羅馬尼亞分隔出來，然後約沿着現今克羅地亞、斯洛伐尼亞與南斯拉夫其他地方的分界線而穿過南斯拉夫國境。在巴爾幹半島，這條線跟歷史上哈普斯堡帝國與奧圖曼帝國之間的邊境相符。這條線的北邊及西邊的民族不是新教徒便是天主教徒，具有歐洲歷史的共同經驗：封建時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等。他們的經濟境況一般較東部民族為好，有機會進一步參與歐洲共同經濟體系，並鞏固民主政治制度。而此界線東